

## “岩窟梁氏”藏晋志题识辑考

柳 森

梁上椿(1888-?),字义乔,山西崞县(今定襄县)人,清季立宪派元老梁善济之三子,早年留学日本,获早稻田大学采矿科工学学士学位。归国后,历任晋北矿务局局长、伪山西省公署参议、山西旅京同乡会副会长等职。此前,学界对梁上椿的关注仅限于其《岩窟藏镜》,是书对中国古铜镜研究独具开拓之功。梁氏的藏书事迹却鲜为人知,也尚未被学界揭示。笔者在国家图书馆从事方志古籍的整理工作过程中,发现了梁氏所藏晋志共175种(180部),足见其对家乡方志古籍之珍视。由进一步探究可知,梁氏藏书室名为“岩窟”,自称“岩窟主人”、“岩窟梁氏”、“岩窟梁三”。目前笔者已见其藏书印有“岩窟梁氏”、“梁氏岩窟藏书”、“上椿”、“梁氏义乔其书满家”、“铜川梁三”、“畦蕉珍藏”、“岩窟所读”、“梁岩窟印”等。值得一提的是,这批方志中尚有梁氏墨笔题识13则,这些题识内容丰富,以藏书家之视角,不仅详述购书轶事与藏书体会,亦讨论版本优劣,这对学界研究“岩窟梁氏”藏书及山西方志古籍版本流传均有裨益。现以梁氏所题时间为序,将这些题识逐录如下:

### 一、《云中郡志》

#### 《云中郡志》

本志修于顺治九年,雕板全与明体相同,坊间极稀见。据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所载,国内外图书馆所藏,共仅五部。此外,民廿九,来薰阁<sup>①</sup>获一部,售与交通公司图书馆,但闻其中有残缺。又,苏氏省吾谓其故里朔县曾藏有一部,现仍存否,正在检查中,余概无所闻矣。客冬,蜚英阁<sup>②</sup>获此一部,

①来薰阁由陈连彬(字质卿,河北南宫人)于民国元年(1912)开设。“至二十年,质卿侄杭,字济川,继其业。原来薰阁字号,在咸丰间有之,为陈质卿之祖伯叔开设,收售古琴。至光绪二十余年,租与他人,至民国元年,经质卿收回,故其匾额曰‘琴书处’者,盖不忘旧也。”(孙殿起辑:《琉璃厂小志》,北京古籍出版社,1982年,第128页)在陈杭的悉心经营下,来薰阁成为当时京城文化人士流连之地,鲁迅、朱自清、郑振铎等名家均是其中常客。

②蜚英阁由枣强县人裴成武(字子英)于民国二十一年开设,设在新清华街长春会馆内(孙殿起辑:《琉璃厂小志》,第121页)。

今归余窟,完整无疵,难得之珍笈也。特为志。梁上椿识。三二,七。

按:《云中郡志》十四卷,(清)胡文烨纂修,清顺治九年(1652)刻本,二十册。是书为金镶玉装,正文首卷卷端下钤印“岩窟梁氏”、“铜川梁三”、“畦蕉珍藏”。识语题于“静文斋”笺纸之上,粘贴于书衣,落款处钤印“铜川梁三”。

此《云中郡志》是以当时“府”的建制比照古制“郡”而命名的。“顺治初年,胡文烨久购得明守汪承爵所纂《大同府志》,首尾三册,与郡之学博子衿辈,斤斤参稽,通牒报可,遂辑其事而纂修。”<sup>①</sup>这部府志对当时大同府及所属四州(浑源、蔚、朔、应)、七县(大同、广昌、怀仁、广灵、山阴、马邑、灵丘)的疆域沿革、建置兴废、分合迁徙、武备配置、人口田赋、水文气象等均有详细记载。同时,是书具有典型的以顺治刻本为代表的清初刻本特点,其版刻风格多有明代遗风,其显著特点即是字形长方、横细竖粗,所以梁氏称“雕板全与明体相同”。识语中言及“据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所载,国内外图书馆所藏,共仅五部”。经查,其所参考的应为民国二十四年(1935)朱士嘉编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,其中记载了这五部《云中郡志》分别藏于北平东方文化委员会图书馆(一部)、国立北平图书馆(三部)、上海东方图书馆(一部)<sup>②</sup>。

另外,明清时期,朔州隶于大同府,民国元年五月改州为县,所以当苏氏友人前来拜会梁氏时,称家乡朔县藏有一部《云中郡志》。梁氏所用笺纸来自“静文斋”,其是当时北平琉璃厂地区著名笺肆。而识语中所言“来薰阁”、“蜚英阁”,均为民国时期北平琉璃厂地区的著名书肆。此本即为梁氏由蜚英阁购入。

## 二、《高平县志》

同治《高平县志》

《高平志》,以顺治板为最早,然已不易见及,仅北平图有二部。坊间习见,惟乾隆板(三十九年),至光绪续志,则亦少见。而介乎乾隆、光绪间之同治六年板,似最为精确。因三晋志书之缮修最普遍者,为乾隆、光绪两代,此外,则除本邑有笃学士绅或好学辑全外,鲜有纂修,故同治板实较他板为佳,取材当然正确也。岩窟梁上椿自志。三二,九。

按:《高平县志》八卷,(清)龙汝霖纂修,清同治六年(1867)刻本,六册。正文首卷卷端下钤印“岩窟梁氏”。识语题于“静文斋”笺纸之上,粘贴于书衣。

识语中所提“北平图”即国立北平图书馆,即今国家图书馆前身。其实,早在明弘治八年(1495),时任县令杨子器即已纂成《高平县志》,但“书已佚,今存王守仁序一篇”<sup>③</sup>。此后,嘉靖、万历、天启间,该志均经重修,但均已佚失。入

①李学勤、吕文郁主编:《四库大辞典》上册,吉林大学出版社,1996年,第1143页。

②朱士嘉编: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中册,商务印书馆,1935年,第9页。

③李裕民辑:《山西古方志辑佚》,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,1984年,第406页。

清以来,《高平县志》先后经顺治、乾隆、同治、光绪四朝重修。现存《高平县志》最早版本即为顺治志,十卷,范绳祖修、庞太朴纂,顺治十五年(1658)刻本。乾隆三十九年(1774),傅德宜修、戴纯纂《高平县志》二十二卷末一卷,其中,卷二图谱较顺治志增学宫、书院、八景十一图,但其体例较顺治志为次,多罗列门目且统属混乱。另外,识语中言及的“光绪续志”为《续高平县志》十六卷,陈学富、庆钟修,李廷一纂,光绪六年(1880)刻本。虽光绪志所载唐牛元敬撰《清化寺碑》为《全唐文》所未收,但其目类多同乾隆志,并无变革。

梁氏推崇此同治志。观此同治志与顺治志、乾隆志、光绪志却有不同,尤其是其中人物、官司、选举等篇目所叙金人之事,可补《金史》之缺。此外,该同治志将“灾异”置于“食货志”下,是为与他志不同之处。值得一提的是,该志前刊有王守仁所撰《高平县旧志叙》,王守仁在叙言中言及“长平之战”,即“予惟高平即古长平,战国时秦白起攻赵,坑降卒四十万于此,至今天下冤之故。自为童子即知有长平,慷慨好奇之士,思至其地以吊千古不平之恨,而不可得,或时考图志,以求其山川形势于仿佛间,予尝思其志”。以此足见《高平县志》之重要,此篇叙言为其他存世版本所无,十分珍贵。

### 三、《灵石县志》

康熙《灵石县志》

《灵志》以嘉庆板为常见,康熙板则除一二大圈外,肆中极勘。三二秋,宋君纯如以在西单小肆见及相告。亟走视之,金镶玉之善本也,惜卷首序文有一页半之抄补焉,索价极昂,数商,方就范。忆夏间,某估以抄本来,索值尚近百,两年前,虽在厂肆亦见同样之抄本,但抄工极劣。今得此善本,喜而识之。岩窟梁上椿。三二,九。(图见封二)

按:《灵石县志》四卷,(清)侯荣圭纂修,清康熙十一年(1672)刻本,四册。卷首《凡例》下钤印“畦蕉珍藏”、“岩窟梁氏”。识语题于“静文斋”笺纸之上,粘贴于书衣,落款处亦钤印“岩窟梁氏”。

识语中所指“抄补之序文”为侯荣圭所撰,序文中简述了修志缘由。其实,查今存《灵石县志》,以明万历二十九年(1601)刻本为最旧,而此康熙志即因循万历志,如在体例方面,其门目未作变化;在内容方面,该志卷首县城、县治图均取自万历志,艺文内容亦以旧为多,因此,该康熙志的文献价值比较有限,不过,因该康熙志存世较罕,版本价值较高,故为梁氏称善。此外,梁氏所言常见的“嘉庆板”即王志融修、黄宪臣纂《灵石县志》十二卷,嘉庆二十二年(1817)刻本。此嘉庆志较康熙志增加学校、武备、古迹三门,体例亦较康熙志合理。

### 四、《凤台县续志》

凤台,即今晋城,旧泽州府之治也。乾隆中,初有志,坊间流传较多。光绪八年,乃复有续志之修纂,距今年期虽近,然比较少见也。兹获某君旧

藏,与其《长治志》一并归余窟焉(此志须与乾隆志合并读之)。三十二年九月。岩窟梁三识。

按:《凤台县续志》四卷卷首一卷,(清)张貽琯、陈继三修,(清)郭维垣等纂,清光绪八年(1882)刻本,四册。正文首卷卷端下钤印“岩窟梁氏”。识语题于“静文斋”笺纸之上,粘贴于书衣,落款处亦钤印“岩窟梁氏”。

乾隆四十九年(1784),林荔修、姚学甲纂《凤台县志》成书,是志二十卷卷首一卷,对旧有《泽州府志》中缺载与谬误之处均加以辨证或补遗。而此《凤台县续志》于光绪七年续修,八年成书付梓,记事亦止于光绪八年。此光绪志乃参乾隆志而作,分目亦遵乾隆志,凡无可续者则不再列目,所续事迹,少者则合而为一,并对乾隆志内容进行了纠误,其续记事时间起于乾隆四十九年,这也是梁氏在识语中特别指出“此志须与乾隆志合并读之”的主要原因。当然,“旧志在里甲目中仅记述里甲而无村庄,此编则按方隅里数详为增入,并绘其图,以备考核。”<sup>①</sup>此即为光绪志之可取之处。

## 五、《潞安府志》

顺治《潞安府志》

《潞志》除明刊《潞州》外,以顺治十六年之志为最古。顺治十六年时,明祚犹未斩,故此志之字体、刻法,仍为明代系统,称为明本,亦无不合。近来府志极缺,即乾嘉所刊亦已稀少,矧明本乎?足珍也。岩窟主人自识。三二,一〇。(图见封二)

按:《潞安府志》二十卷,(清)杨骏修,(清)李中白、周再勋纂,清顺治十六年(1659)刻本,十册。正文首卷卷端下钤印“岩窟梁氏”。识语题于“静文斋”笺纸之上,粘贴于书衣,落款处亦钤印“岩窟梁氏”。

题识中所言“明刊潞州”即为明弘治八年(1495)版《潞州志》,实际上,除此之外,尚有明刊“潞志”存世,即现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的明万历四十年(1612)版《潞安府志》,因此,梁氏“以顺治十六年之志为最古”之说有误,但囿于当时的信息条件,其得此结论情有可原。同时,观此梁氏所藏顺治本《潞安府志》,在版刻风格上确有明本风格,而正如其所言,在山西方志中,府志本就不多,故此《潞安府志》确可视为珍本。

## 六、《交城县志》

光绪《交城县志》

事变前,《交城志》极伙,而光绪刊更甚。兵燹之后,亦成不易见之籍。偶于隆肆获之,归而审视,乃吾师张贯三翁旧藏。贯师学业深邃,藏书尤富,虽闻民廿六之变稍有损失,然不审此书果系兵祸否?微闻有不肖子常

<sup>①</sup>李学勤、吕文郁主编:《四库大辞典》上册,第1161页。



窃书以肆,未知此亦属诸否?又其万卷晋志,今夏以万金售诸新民图,此或其重本欤?椿志,三二,一〇。

按:《交城县志》十卷卷首一卷,(清)夏肇庸纂修,清光绪八年(1882)刻本,八册。正文首卷卷端下钤印“岩窟梁氏”。识语题于“静文斋”笺纸之上,粘贴于书衣,落款处亦钤印“岩窟梁氏”。书名页有墨笔题识:“民国五年九月二十七日靳子洁先生持赠贯三。”

由梁氏识语可知,该书由梁氏收于北平隆福寺书肆。是书为梁氏恩师张籛<sup>①</sup>旧藏。张籛是近代华北地区著名藏书家、教育家,其典籍收藏广盈,藏书达二十万册。作为私家藏书,张籛收藏的史部书侧重于方志,“山西全省各府州县志,除平鲁、方山两县外,全部收入囊中。”<sup>②</sup>其将藏书悉数让售于山西大学图书馆和山西省图书馆。一方面,“山西大学图书馆古籍藏书 13 万册,其中近 55000 册由近代华北地区大藏书家、山西著名学者、教育家张籛先生酌资捐赠”<sup>③</sup>。另一方面,其所藏方志于抗战时期让售于新民图书馆,即今山西省图书馆前身,这也证实了梁氏在识语中所言“又其万卷晋志,今夏以万金售诸新民图”。此外,有关张籛藏书的研究成果也已指出:“无奈其子却不争气,盗卖珍籍,毫不手软。”<sup>④</sup>因此,该书为张籛之子盗卖于市的可能性较大,即梁氏揣测的“微闻有不肖子常窃书以肆”,而并非当时的山西新民图书馆佚出的复本。

## 七、《续修隰州志》

贞如有此复本,适坐获《孝义》轻薄本二部,因以其一互换焉。椿识,三三,三。

按:《续修隰州志》四卷,(清)崔澄寰修,(清)王嘉会纂,清光绪二十四年(1898)刻本,四册。是书正文首卷卷端下钤印“卤城范氏贞如藏书”、“梁氏岩窟藏书”。识语题于书衣。该书为梁氏与好友范贞如交换所得。范贞如,应为下文识语中提及的“吾友范氏秀峰”,即范秀峰,字贞如,山西卤城(今繁峙县)人。另,因梁氏专收山西方志,故识语中所指的“《孝义》轻薄本”,或为《孝义县志》,但具体何种版本则仍待考证。

## 八、《兴县志》

此本系乾隆癸未原版,于光绪庚辰重印,并由署县事张启蕴<sup>⑤</sup>加增仓

①张籛(1872-1959),字贯三,号闻三、闲田,山西平陆人,清光绪二十六(1900)年举人,京师大学堂法律系毕业,曾任山西大学教授、山西大学文学院院长。解放后,任山西省政协常委、省人民政府参议。

②李文林:《张贯三先生及其藏书》,《文史月刊》2000年第7期。

③④何满红、张梅秀:《张籛古籍题跋选录》,《晋图学刊》2012年第3期。

⑤张启蕴,字绍南,正蓝旗人,清光绪四年(1878)任兴县知县。

厰、书院两图增入,其他均仍旧观。惟《中国地方志综录》则载有光绪六年张启蕴纂修《兴县志》二卷,臆必另有续本。此则仅有二图,并无续志。岩窟志。卅三年九月。

按:《兴县志》十八卷,(清)程云修,(清)孙鸿淦纂,(清)蓝山续纂修,清乾隆二十八年(1763)刻光绪六年(1880)藩州张启蕴永兴斋增刻本,四册。该书钤印“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藏书印”、“梁氏岩窟藏书”、“梁氏义乔其书满家”。识语题于“静文斋”笺纸之上,粘贴于书衣,落款处亦钤印“梁氏义乔其书满家”。

是书应先藏于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,或为多馀复本,由梁氏交换所得。兴县有志,起于明万历年间,即知县朱学介纂万历五年(1577)刻本。入清以来,雍正八年(1730),程云修、孙鸿淦纂《兴县志》十八卷刻本面世。之后,乾隆二十八年,知县蓝山续修该志。不过,乾隆志卷目比雍正志仅新增“仓储”一目,故著名方志学家瞿宣颖称其“应自不凡,然俭陋特甚。”<sup>①</sup>同时,《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》评价乾隆志为:“是志之编纂,毫无特长,只在前志之职官、户口、田赋、选举、人物、艺文各目增雍正以来三十馀年之事,其余因袭旧志,不作参订。”<sup>②</sup>光绪六年,张启蕴增刻乾隆志,如梁氏所言,此志仅新增常平仓与崞山书院两图,且均为张启蕴手绘,其在此增刻本中言:“图者,所以形容其所言也。仓厰、书院,颠末均已分详各志,今并绘图于后,聊以当览志者之卧游耳。时光绪庚辰清和之月,署县事藩州张启蕴涂。”同年,张启蕴又修《兴县续志》二卷,即梁氏所言之“另有续本”。此“续志”较前志新增“仕宦”、“节妇”二目,但在职官人物条目行文中出现了时代前后倒置之误,是为硬伤,同时,“唯金石碑刻古迹,前志不载,续修未补,是为缺陷。”<sup>③</sup>

## 九、《孟县志》

余获嘉靖志孤本于故都书肆,校其叙,缺第二页,而原文与此复颇有出入,其第二页按旧志注正之,第二页无从核校,第三页则舛错更多。意旧志叙残缺不全,纂此志时仅获其一部分,而搀以私意补成之欤?民国三十三年十二月梁上椿识。

按:《孟县志》十卷卷首一卷卷末一卷,(清)马廷俊修,(清)吴森纂,清乾隆四十九年(1784)刻本,八册。正文首卷卷端下钤印“岩窟梁氏”。书中有梁氏墨笔批校。识语题于卷首《序例·旧序一》文末。

查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著录可知,现存《孟县志》最早版本是明万鉴

①瞿宣颖撰:《方志考稿甲集》第五编,民国19年(1930)天春书社铅印本,第11页。

②金恩辉、胡述兆主编:《中国地方志总目提要》上册,台北汉美图书有限公司,1996年,第62页。

③刘纬毅主编:《山西文献总目提要》,山西人民出版社,1998年,第211页。

修、张淑誉纂的,有嘉靖三十年(1551)刻本,此即识语中所言的其获于北平书肆的“嘉靖志”。不过,该嘉靖志“草创简略,且多漏缺”<sup>①</sup>。识语中的“叙”,即嘉靖志所载时任孟县知县万鉴所撰序言,亦即此乾隆本中卷首的《序例·旧序一》,梁氏对以上两版本所载的万鉴序言做了详细比对,从而得出了乾隆本之万鉴序言为残补而成的结论。同时,经笔者与同版本他志比对,此梁氏藏本尚缺清瑋序,此序撰于乾隆四十九年,其在序言中简述了孟县概括与修志缘由,并言参校《孟县志》一事。

## 十、《平顺县志》

### 影抄《平顺县志记》

余读晋志始于丁丑之后。全晋方志之中,最稀见者,当推平顺。因平顺在清初原属独立,故康熙时尚有志,而乾隆初合并于潞城,故乾隆时大修晋志,而平顺缺焉。光绪时,仍为乡治,故曾沅甫抚晋时再修县志,而平顺又不与焉。其康熙本复因年岁久远,兼以县治久废,无人注意保存,致流传极鲜。北平圃前虽存有一部,而丁丑南移,又致散佚。吾友范氏秀峰得一部于并市冷摊,喜以见示,因命侄子继武于公馥影抄,以资研读。凡两阅月而竣事,因濡笔而识之。三四,二,二。尧山梁上椿识于岩窟。

按:《平顺县志》十卷,(清)杜之昂修,(清)路跻垣纂,民国三十四年(1945)梁上椿抄本,四册。正文首卷卷端下钤印“梁氏岩窟藏书”。书衣有梁氏墨笔题“康熙平顺县志十卷,四册,岩窟”,书名页题“康熙平顺县,岩窟影抄”,并钤印“梁氏义乔其书满家”。识语题于卷首,落款处钤印“上椿”。

此为梁氏影抄清康熙三十二年(1693)刻本《平顺县志》。由识语可知,第一,如其所言,《平顺县志》的文献价值在于其独有性。明嘉靖时,平顺始置县,因行政区划整合,平顺县在清乾隆二十九年(1764)并于潞城,因此,此康熙本《平顺县志》即为绝版,故而梁上椿称其为“全晋方志之中,最稀见者”。是书所载内容对于后世了解、研究平顺的历史文化及潞城的历史沿革均大有裨益。第二,抗战爆发后,为使国家珍籍免遭不测,国立北平图书馆奉命将善本古籍装箱,开始馆务南迁。识语中提及的国立北平图书馆丁丑南移,确与史实吻合。在此过程中,难免会出现极个别典籍散佚等情况,这也使得部分典籍存世渐罕,难以得见。不过,需要指出的是,梁氏所言国立北平图书馆藏康熙本《平顺县志》因南移而散佚一事,并不符合史实,经查,国家图书馆现藏2部康熙本《平顺县志》,且均为民国旧藏<sup>②</sup>。第三,识语中明确了是书的成书过程。梁氏好友范秀峰收得一部康熙本《平顺县志》,地点是“并市”,即今太原市,而身在

<sup>①</sup>陈光贻:《稀见地方志提要》上册,齐鲁书社,1987年,第165页。

<sup>②</sup>经查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目录卡片可知,此2部康熙本《平顺县志》均为民国时期入馆旧藏,现均已提善,索书号为A04489、A04490。

北平的梁氏得见此书,遂令侄子梁继武利用公暇时间影抄一部。

### 十一、《静乐县志》

影抄《静乐县志记》

丁丑以还,吾业停顿,闭户攻书,聊迁岁月。三十年时,偶有晋西北乡野之游,归而致力于晋志之研读。费三年之久,晋志已搜有成数,且获如嘉靖《孟县志》、康熙《寿阳志》、顺治《云中郡志》、顺治《浑源志》等诸珍本,而惟“静乐”、“平顺”两志不遇焉。平顺偶于吾友范氏秀峰处见及,而“静乐”则除山西教育馆外未之见。其康熙本及雍正本,北平图虽有存,而南移后,竟告遗失;同治本则只闻天津任氏保有焉。爰托范氏向教育馆借出传抄,以资流传。惟原本印刷模糊,字句颇有残缺,而同治本则竟至无法辨认,乃托徐氏文堂影抄康熙、雍正两志,至同治本,则俟异日,并采范氏主张,将康熙、雍正两种分订,以免混同焉。中华民国三十四年二月二日。梁上椿识于故都。

按:《静乐县志》十卷,(清)黄图昌纂修,民国三十四年(1945)梁上椿抄本,四册。书衣有梁氏墨笔题“康熙静乐县志十卷四册,岩窟。”书名页题“康熙静乐县志”,并钤印“梁氏义乔其书满家”,序钤印“梁氏岩窟藏书”。识语题于卷首,落款处钤印“上椿”。

由上文“余读晋志始于丁丑之后”可知,梁氏系统研读山西方志始于民国二十六年(1937,丁丑),原因在于“丁丑以还,吾业停顿,闭户攻书,聊迁岁月。”即因社会时局的骤变,使其事业受到严重影响,继而致力于收藏、研读晋志。因家乡的地域因素及专业知识背景,梁上椿的事业由煤炭业起步。1918年,其由日本学成归国,“任山西保晋矿务局矿师,河南中原煤矿公司总工程师,本溪湖煤铁公司技师,并陞矿务局矿师,平奉路局课长,津浦货捐局总办”<sup>①</sup>。1924年,阎锡山在大同创办军人煤厂,1929年,阎锡山请梁上椿出任董事兼经理,并将煤厂更名为晋北矿务局,由阎锡山任董事长。1930年,梁上椿任晋北矿务局局长,负责全局业务管理并取得了出色业绩。1934年,梁上椿出任阎锡山投资兴办的天津大同矿业公司经理。该公司将山西大同、阳泉的煤炭外销至天津、上海、日本等地,盈利颇丰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梁上椿将职工全部遣散并宣告公司停办。

此为梁氏影抄康熙三十四年(1695)刻本《静乐县志》。同时,现国家图书馆藏雍正本《静乐县志》亦为抄本,由国立北平图书馆于民国二十二年据故宫藏雍正八年(1730)刻本影抄。此外,梁氏同时影抄的雍正本,现亦藏于国家图书馆,但是书原缺卷二、五。另外,该志之“同治本”即清同治五年(1866)刻本《静乐县续志》,是志二卷,张朝玮纂修。如梁氏所言,此同治志十分罕少。参看

<sup>①</sup>刘国铭主编:《中国国民党百年人物全书》,团结出版社,2005年,页1998。

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著录可知,现仅天津市图书馆及山西省图书馆收藏。梁氏曾托人借阅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藏本,此馆即为现山西省图书馆前身。而识语亦提及“同治本则只闻天津任氏保有焉”,此“天津任氏”应为民国时期专以收藏地方志而著称的藏书家任凤苞<sup>①</sup>。任凤苞是民国时期私家藏志“巨擘”,也有研究者称“任凤苞是我国藏书史上唯一的一位专门收藏地方志的藏书家”<sup>②</sup>。其藏书斋名“天春园”,后因得原钞本《康熙大清一统志》、清殿版《方輿路程考略》和《皇輿全览》三残本,故又名其室“三残书屋”。据任氏自撰《天春园方志目》载,其藏志达2536种<sup>③</sup>,约占我国现存方志种数的三分之一。其数量之庞大,在我国私家藏志中可谓空前绝后,且多珍善之本。解放后,任凤苞将其所藏志书全部捐赠给天津市图书馆,其中,即包括梁氏提及的这部“同治本”《静乐县续志》。

## 十二、《崞县志》

后印《乾隆崞志》

《乾隆崞志》,县令邵、顾二氏所重修,而原稿成于邵令之时,顾令付剞劂时,又搜罗遗佚,成书二卷,顾又序之,所以称前编邵令稿、后编乃顾续稿,初印本均为前编八卷续编二卷。其顾之又序则附续编之前焉。其后不知何时再用原板付印之际,将续编两卷消除,或存板散佚,因而省去,惟续编之顾又序则留存,而附于篇首。后印颇模糊,且因避忌满清种族关系,将原板中之“突厥”、“胡”、“虏”、“北寇”等字均易换焉。兹特表而出之,以便读者。铜川梁上椿志。三四,六,一六。

按:《崞县志》八卷,(清)邵丰鏊、顾弼等纂修,清乾隆二十二年(1757)刻民国间印本,四册。书签有梁氏墨笔题“乾隆板后修改印本,无顾补两卷。”正文首卷卷端下钤印“梁氏岩窟藏书”。识语题于“通成公司北京分公司用笺”上,粘贴于书衣。

梁氏在识语中详细讨论了乾隆本《崞县志》的成书过程。是志修于清乾隆二十一年,二十二年付梓。其实,梁氏原已藏有此乾隆二十二年本《崞县志》,且藏有相同版本的顾弼纂修的《崞县志续编》二卷,同时还收有光绪八年(1882)本《续修崞县志》<sup>④</sup>。正因其对《崞县志》版本收藏全面,且存其全帙,方得出顾弼续编两卷在此后版本中散佚而仅存其序言的准确结论。此外,梁氏注意到了光绪本《崞县志》中的“突厥”、“胡”、“虏”、“北寇”等避讳字被替

①任凤苞(1876-1953),字振采,江苏宜兴人,民国时期著名银行家、方志收藏家。曾任中华民国全国铁路协会评议员、金城银行董事、中南银行董事、盐业银行董事长、“北四行”(盐业、中南、金城和大陆四银行简称)信托部执行委员等职。

②江庆柏:《任凤苞与地方志收藏》,《中国地方志》1999年第4期。

③任凤苞撰:《天春园方志目》,民国25年(1936)荆溪任氏天春园朱印本。

④梁上椿所藏三种“崞县志”现均藏于国家图书馆。

换,从这一细节可知,梁氏并未局限于藏书,更细心研读、比对版本间异同与优劣,可见其对山西方志颇有研究。

### 十三、《永和县志》

#### 影抄《康熙永和县志》

余致力于攻读晋志以来,搜集晋志殆全,惟永和县志迄未见及。北平圃旧有藏本,而南移后,似已佚失。民廿二,来熏阁书肆以民国十九年铅印《永和县志》来,正商购中,而友人范秀峰氏来自并州,谓如系旧考,高价自不当惜,如铅印新本,则原书必等年期亦近,流传必较夥,不难获也,当代为留意,数坐可获也,乃任之。不意自日之后,竟不获再遇焉。廿三秋,与太原教育馆商,以所藏古籍与馆中复本晋志相交换,而永和因馆中只有康熙本一部,不与焉,乃商借来,并嘱李铭氏影抄一部。不意在未抄竣之际,刘氏吉甫为余由晋西山间访得民国十九年铅印本,见赠。喜其同时获得两志,乃特志之。民国三十四年二月崞县梁上椿自识。晋圃藏本缺刘氏、段氏原序,民十九铅印本载有焉,因亦摘抄补入,以期全璧。三四,七,二一,又志。

按:《永和县志》二十四卷,(清)王士仪纂修,民国三十四年(1945)梁上椿抄本,四册。本书钤印“梁氏岩窟藏书”、“梁氏义乔其书满家”。书衣有梁氏墨笔题“康熙永和县志二十四卷四册,岩窟”。识语题于卷首,落款处钤印“上椿”。

《永和县志》创修于明永乐、正统间,但清康熙四十九年(1710),刘愈深在该志序言中提及:“吾永之志,自明季闯贼入寇,屠戮殆尽,版籍荡然。康熙十二年,署事张公始采辑成书。”即康熙十二年知县张君美复修县志,不过,未经数年该志即佚。故此,康熙四十九年之际,王士仪参校《山西通志》、《平阳府志》,增其人物,修成此志,此志即为梁氏影抄之底本。梁氏在识语中详述了影抄此康熙志的来龙去脉。其中,梁氏对国立北平图书馆的重视可见一斑,涉及山西方志的收藏情况,其首先想见的便是该馆,由此也可窥见其时该馆在方志古籍收藏方面的权威地位。同时,梁氏友人范秀峰表达了其时古籍收藏的一些规律,即重视民国之前刻本,而轻视民国间铅印本。再者,梁氏欲与“太原教育馆”交换古籍,可见,当时此种“古籍复本易换”现象十分普遍,且已成为藏家互通有无、丰富藏品的重要手段。同时,笔者发现梁氏收藏的若干晋志书衣多钤有“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藏书印”,由此亦可知,识语中所提“太原教育馆”即为“山西省立新民教育馆”,即今山西省图书馆之前身。此外,识语中提及“太原教育馆”藏本缺刘氏、段氏原序,即指康熙四十九年刘愈深、段丕猷所撰序言。

此外,梁氏亦藏有民国十九年(1930)铅印本《永和县志》,该志十六卷卷首一卷,四册。书衣有梁氏墨笔题:“民国永和县志十六卷四册,岩窟,三三,一二。”书中钤印“梁氏岩窟藏书”、“梁氏义乔其书满家”。

作者工作单位:国家图书馆古籍馆



康熙重刊增補  
聖名之義廣取為常見康至而即除二大圖外  
歸中極數三三林崇天純以世世軍小肆見  
及相長而理之全錄之義本已皆卷首序  
文有一頁半之缺補為崇實極昂一萬高方  
就藏懷多問目本以缺本崇實但西字百兩  
年前雖在歐陽其見同標之缺本但缺之極多  
今以此義本考四藏之  
嚴從梁上校  
三九

文見第 134 页

順治路安符老  
洪亮除明刊濠州外以順治十六年之老為最  
古順治十七年時明祚猶未斬故以老之字  
體弘治明為明代系統極為明本亦  
無不介近來有志地缺即乾嘉所刊亦已  
稀少矧明本乎足珍也  
嚴從梁主人白謝  
三九

文見第 135 页

玉坡仁兄丈人麾下送感者弟於  
十三日自蘇盛行十四日到潯歸  
路最苦  
兄傷派勇丁數名於十四日到德清  
守候而弟之墊枕在柳樹山館  
暫回以斜遇候  
威格以安旅枕因系各商防務吃  
緊必身即少派隨使撥中五人亦  
可也  
尊處未便派巡達 費銀亦大  
徑領派人六人可也此致兄  
弟安  
王多倫  
丙午

文見第 147 页

玉坡仁兄丈人麾下別來  
知蘇州感念之極頭 桂平已印  
行新金回桂全  
尊處一新裁高而計共三都  
無知亦大相共六六相請  
依那系山取去是時手山路請  
初安諸惟  
亮回云  
王多倫  
丙午

文見第 148 页